

# 闽学序说

高令印

摘要: 闽学是指以定居于闽中的朱熹为首包括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的思想, 以及其后福建理学家的思想。闽学是与其他地域性学派并称的, 集濂、洛、关诸地域性学派之大成。闽学不是历史上的一般闽中之学, 是与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理学思潮相关联、共始终, 是其核心部分。朱熹之前的游酢、杨时、罗从彦、李侗等的道南学是“前闽学”, 没有道南学就没有闽学。闽学的重大特点和优点是著述的义理诠释与事迹的考察辨析并行, 朱熹所到之处是“过化处”, “走朱子之路”就能提升道德意识。以传统方式研究闽学已趋向饱和, 研究成果缺乏可读性和普及性, 作者群即读者群扼杀了闽学的生机及其“治心”的文化价值。要开辟出闽学研究的新境界, 把其成熟心智、健全人格和安身立命之学的内在本质阐发出来, 为当今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关键词: 闽学; 道南学; 文化重心南移; 治心之学

DOI:10.13658/j.cnki.sar.2017.06.024

作者简介: 高令印, 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国朱子学会名誉会长、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中图分类号: B24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569(2017)06 - 0188 - 12

## 一、“闽学”界说

闽学是地域性学派, 它产生和形成于南宋时的福建, 创始人是福建建阳的朱熹, 初期活动于闽、浙、赣交界之武夷山一带。闽学是与北宋江西庐山濂溪周敦颐的濂学、河南洛阳程颢程颐的洛学、陕西关中张载的关学等相并称的。福建地区称为“闽”, 最早见于先秦典籍《山海经·海内南经》, 谓“闽在海中”。《周礼·夏官司马》谓有“七闽”。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 置福建经略使, 首次出现福建名称;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777), 始用古称闽中或闽作为福建的简称。闽学即福建朱子学派。

闽学这个概念出现于朱熹卒后不久。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讲到南宋末年学者王应麟(1223 - 1296)时说:

咸淳元年七月, 除著作郎时, 汤文靖公为太常少卿, 与先生邻墙居, 朝夕讲道, 言关、洛、濂、闽、江西之同异。<sup>①</sup>

咸淳为南宋度宗年号, 其元年为1265年。此处提及闽学概念的时间是朱熹卒后65年。

<sup>①</sup> 黄宗羲等《深宁学案·深宁文集附录》,《宋元学案》卷八五, 中华书局1986年版, 第2866页。

元朝道学(理学)盛行,亦称闽学盛行。清蒋垣说:

姚枢(按元朝广西柳州人)隐于苏门,以道学自任,刊《小学》、“四书”及蔡氏《书传》、胡氏《春秋传》,而闽学至于河朔矣!<sup>①</sup>

《小学》、“四书”(即《四书集注》)皆朱熹著作。朱熹门人建阳蔡沈著《书经集传》,是闽学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和福建早期理学家崇安胡安国的《春秋传》,是元明清时代朝廷科举取士的教本。此后,明清理学家宋濂、解缙、薛瑄、陈鼎、蒋垣等先后说:

自孟子之歿,大道晦冥,世人撻埴而索涂者,千有余载。天生濂、洛、关、闽四夫子,始揭白日于中天,万象罗列,无不毕见,其功固伟矣。而集其大成者,唯考亭朱子而已。……朱子之学菽粟布帛也,天下不可一日无也。<sup>②</sup>

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sup>③</sup>

濂、洛、关、闽之学,一日不可不读。周、程、张、朱之道,一日不可不尊。舍此而他学,则非矣。<sup>④</sup>

我太祖高皇帝继位之初,尊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成祖文皇帝,益广而大之,今儒臣辑“五经”“四书”(按朱熹《四书集注》)及《性理大全》,颁布天下。<sup>⑤</sup>

濂、洛、关、闽皆以周、程、张、朱四大儒所居而称。然朱子徽州人,属吴郡,乃独以闽称何也?盖朱子生长于闽之尤溪,受学于李延平及崇安胡籍溪、刘屏山、刘白水数先生。学以成其德,故特称闽,盖不忘道统所自。亦犹邵子范阳人,游学于洛,因家焉,遂为河南人是也。<sup>⑥</sup>

“不忘道统所自”是从传授系统的意义上来讲的。由于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的游酢、杨时、胡安国、胡籍溪、刘子翥、刘勉之、罗从彦、李延平(侗)等人的倡导,福建理学兴盛起来,朱熹直接或间接地师承他们,由此跟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周敦颐等联系起来。近代以来知名学者梁启超、张岱年说:

福建,朱晦翁(熹)侨寓地也,宋以来称闽学焉。<sup>⑦</sup>

闽学与北宋的濂、洛、关之学并称为“濂、洛、关、闽”,这是宋明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朱熹生存期间,经常与江西陆九渊的心学、浙江陈亮的功利之学进行辩论。学派的划分与地域有一定的关系,而福建地区是朱学的主要根据地。<sup>⑧</sup>

以上所引诸大学者之说,不仅强调学派的地域性,更是推崇闽学和朱熹。钱穆说:

后人言北宋理学,必兼举周、张、二程,然此事论定,实由朱子。朱子与北宋理学,汇通周、张、二程四家,使之会归合一。……故朱子虽为理学大宗师,其名字与濂溪、横渠、明道、伊川并重,后人称为濂、洛、关、闽,然朱子之理学疆界,实较北宋四家远为开阔,称之为集北宋理学之大成,朱子决无愧色。<sup>⑨</sup>

把朱熹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列,闽学是濂、洛、关诸理学的集大成者,集传统文化之大成,建立起庞大完整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

①⑥ 蒋垣《八闽理学源流》卷上,福建省图书馆1984年复印本,第13—14、14页。

② 宋濂《理学纂言序》,《文宪集》卷五,景印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集部第62册别集类,世界书局(台北)1986年版,第106页。

③ 张廷玉等纂《解缙传》,《明史》卷一四七,《二十五史》第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28页。

④ 黄宗羲《文清薛敬轩先生瑄·读书录》,《明儒学案》卷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3页。

⑤ 陈鼎《高攀龙传》,《东林列传》卷三,影印《四库全书·史部》本。

⑦ 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分布》,《饮冰室文集》第4册,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4页。

⑧ 高令印、陈其芳《福建朱子学》张岱年“序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⑨ 钱穆《朱子新学案》,巴蜀书社1986年版,第18、19页。

近代以来一些知名学者研究 游酢、杨时等及其后的罗从彦、李延平、朱熹等 他们只是闽中理学的师承系统 游、杨所传道南学的核心义理“默坐澄心”之教到李侗为止;朱熹另辟蹊径,创立闽学。“从师承上说,朱子当然是延平弟子;但若专就理之脉传而言,朱子实不传龟山延平之学。黄梨洲所谓‘龟山三传而得朱子,而其道益光’,实只是单从师承上说的仿佛之见。朱子所光大的,乃伊川(程颐)之道,并非龟山之学。龟山一脉,实到延平而止。”<sup>①</sup>刘述先说:

程门另一高弟杨龟山倡道东南,再传弟子李侗(延平)即朱子之业师。但朱子并未契于龟山一系的“默坐澄心”之教,且不幸延平早逝,不得不自己努力,强探力索,苦参“中和”,一直到三十九岁才真正找到自己成熟的思路。朱子自述早年误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乃在未发上面用不上工夫,不免急迫浮露。后仔细咀嚼伊川(程颐)遗教,特别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语,才涣然冰释,为问题找到了满意的答案,从此认定性即是理,心则周流贯彻、通贯乎未发已发,在未加时只是涵养,已发之后则用省察。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而静贯动静。自此不复有疑。<sup>②</sup>

但是,闽中历代学者,如明朱衡《道南源委》、清蒋垣《八闽理学源流》、清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清张伯行《濂洛关闽书》等,皆把朱熹之前的闽中理学(道南学)与闽学等同起来,认为它们都是闽学。事实上,道南学并非全是“默坐澄心”。先后相继的学术派别,后者对于前者,有继承也有摒弃,是学术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sup>③</sup>认为朱熹绕过杨时、李侗等闽中早期理学家的思想,直承程颐,所谓“程朱理学”即程颐朱熹理学,是片面的、绝对化的说法。据统计,朱熹等闽学家们在研究“四书”等的著作中,大量引用游酢、杨时、罗从彦、李侗等人的观点说明自己思想。朱熹对自己一脉相承业师的学术思想具有深刻的继承关系。游、杨等是闽学的先驱者,道南学是闽学的直接根源,没有道南学就不可能有闽学。道南学是“前闽学”。<sup>④</sup>

另外,崇安胡氏之学也是闽中理学的重大派别,胡安国之学传授给胡宏、张栻,他们活动于湖南,形成湖湘之学。以张栻为代表的湖湘之学,重在明义利之辨,突出“心”的主宰作用,具有明显的心本论特色,与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理本论是有所不同的。

总的来说,朱熹是闽学的创始者和领袖。因为闽学与朱子学都是以朱熹为首的学派,南宋时闽学和朱子学是一致的,而后闽学和福建朱子学也具有相同的意义。一般来说,闽学超出福建范围成为国家的主体思想和世界性的学说之后,应称之为朱子学。

## 二、闽学是儒学复兴的产物

由先秦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至西汉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后,便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思想。到了东汉后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暴露出其内在的矛盾。因为把儒家定为一尊,文化划一有序,就会逐渐导致僵化。文化的主要承担者知识分子,跟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社会上层的既得利益者,或者说成为统治者的工具。他们只是沉溺于正统官学(经学)之中,而无探索新思想。文化是国家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方式,同衣食住行一样不可须臾离。旧的正统官学停滞不前,不能满足社会对文化思想的需求,自然就不能一直维系人心,社会政治必然动摇。东汉的“党锢之祸”又尽力迫害知识分子。因此,上层社会承担不了文化思想的重任,文化思想的活力自然就转移到民间。这就必然使根植于民间的道家思想发展起来。

① 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方向》,学生书局(台北)1984年版,第211页。

② 刘述先《文化与哲学的探索》,学生书局(台北)1986年版,第267页。

③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④ 林拓《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两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兴盛起来的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结合,形成为玄学。玄学的经典是《周易》《老子》《庄子》“三玄”,用道释儒,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由于道家的“无”在玄学中得到发扬,而“无”又与佛教的“空”相通,于是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便有了发展的契机;在东汉产生的土产品民间信仰道教,与舶来品佛教争高低,其思想贫乏,主要用“夷夏论”敌不过佛教,便以先秦道家老子作教主,把《老子》作为自己的理论,便发展起来。经过南北朝,儒、佛、道三教由论争到融合。到了隋唐,由于老子(李耳)与皇帝同姓(其实皇帝之李是少数民族,与李耳之李不同),得到朝廷的崇奉,道教进一步壮大起来;佛教中国化,成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而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思想儒学却奄奄一息。这时,佛教势力最大,南北朝隋唐皇室大都笃信佛教,知识分子大都出入佛、道。佛、道倾国奉,几成主体。朱熹说“某尝叹息,天下有些英雄人,都被释氏引将去,甚害事!”朱熹十分忧患“三世之后,亦必被他转了!”“可畏!可畏!”国亡先亡文化,是非常严峻的问题!<sup>①</sup>

正因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儒学动摇,人们缺乏精神支柱。没有了儒家的内圣成德,社会人心坠落。唐末五代人道扫地,人无廉耻。最显明的例子是冯道,竟是五代“五朝元老”。牟宗三说“汉、唐两代为盛世,国势强大,典章制度亦甚多可取之处,但是于道德性方面正视人道、人性的学问,偏无所用心。宋儒深感唐末五代社会的坠落与人道的扫地,因而以其强烈的道德意识,复苏了先秦的儒学。”又说“宋儒是真能清澈而透澈地立于道德意识上而用其诚的,因而亦真正能把握儒圣立教之本质。新儒学的兴起,五代的坠落是直接唤醒其道德意识的机缘;但其兴起的机缘还不止于此,还有另一方面,就是对佛教的抵御,间接地因佛教之刺激而益显其‘道德性的理性’之骨干之不同于佛、老。……残唐、五代衰乱,世道人心败坏,人无廉耻,这是最大的惨局。在这个背景下,才要求儒家的复兴。宋明儒家完全是道德的觉醒。宋儒的兴起就是对着残唐、五代的人无廉耻而来的一个道德意识的觉醒。道德意识的觉醒就是一种存在的呼唤,存在的呼唤就是从内部发出来的要求。”<sup>②</sup>

一般认为,唐、宋两个时代,唐比宋文化高,外国人也以唐称中国,把中国人名为唐人。但是,唐的文化是表面的、形象化的,没有树立起和传承下来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因此,接着唐的五代十国,人们无道德意识,人心不古,社会混乱,政权割据和反复更替,人民生活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相反地,宋朝的文化最成熟,人们的道德意识最高。南宋末年朝廷已大势所去,还出现文天祥等伟大的民族英雄!当代最权威的史学家陈寅恪、邓广铭等,谓“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sup>③</sup>宋代文化“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sup>④</sup>

在中华民族主体文化思想儒学存亡、兴废的关键时刻,率先提出复兴道学(即理学、新儒学)的是唐朝学者韩愈和与韩愈同登“龙虎榜”(唐德宗贞元七年,791)进士的闽中晋江人欧阳詹。他们极力排佛,以复兴中断了的儒家道统为己任。理学开始时称为道学,韩愈提出一个与佛教法统相对立的儒家道统。欧阳詹曾任“国子监四门助教”。<sup>⑤</sup>从明代起,有人认为欧阳詹也是理学(道学)的开创者。清李清馥认为“闽中儒学开先始于唐欧阳四门。”“闽学开自唐欧阳四门倡起,彼时人文未著也。”<sup>⑥</sup>这里所谓闽学,即理学(道学)。欧阳詹的理学观点和韩愈差不多,只是在文学和反佛方面没有韩愈出名。和欧阳詹同时的闽中莆田人林蕴,也和韩愈、欧

①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83—3184页。

② 牟宗三《宋明理学的问题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8、74页。

③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

④ 邓广铭《谈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⑤ 欧阳修纂《欧阳詹传》,《新唐书》卷二〇三,《二十五史》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18页。

⑥ 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一,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阳詹一起提倡儒家道统,反对佛教。但当时中国古代社会才开始向后期过渡,适应这种社会性质需要的韩愈、欧阳詹、林蕴的理学(道学)思想也未充分地发展起来,正如上引李清馥所说的,“彼时人文未著也”。值得注意的是,欧阳詹、林蕴的理学(道学)思想,却说明了早在唐代理学萌芽阶段,闽中就出现理学。复兴儒学的任务最后是由闽学完成的。

北宋学者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以及邵雍等,确立理学,分别创立了濂、洛、关等诸理学派别。他们基本上把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思想儒学复兴起来,重建道统,重新树立起孔子的崇高地位。但是,不久北方的少数民族金人将入主中原,北宋将要灭亡。金人文化落后,承担不了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思想儒学又到了一个存亡、兴废的关键时刻,道统又将中断,唯一的出路是把理学移植到南方。当时大哲学家邵雍说:“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矣!”<sup>①</sup>“地气”即国家的文化重心。于是,闽中学者游酢、杨时,以及胡安国、王蘋、陈渊、罗从彦等,适应历史的需要,到北方河南或在朝廷等地拜师学道。游、杨拜师程颢和程颐,“程门立雪”学成回闽时,程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他们“载道南归”。<sup>②</sup>“道南”是中国文化重心由北方中原一带逐渐往南方转移的源头活水。

游、杨等之理学三传而至朱熹,进一步以儒学融合佛、道之学,深入研究古代典籍,注疏辨伪,认为《易》是卜辞,《诗》多讲男女情爱,《书》为伪书,《礼》是秦汉后作品,《春秋》三传皆历史,推倒两汉以来树立起的“五经”在国家上层建筑中的主导地位,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代替“五经”的权威,准确地指出“四书”才真正能体现出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朱熹把它们联成一体,并精加注释,形成为集大成的新儒学(理学)思想体系。朱熹的《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时代儒学教育和科举取士的标准教科书。在宋代以前称为“周(公)孔”,之后称为“孔孟”,这是中国文化的重大转折点。从佛教传入中国到朱熹时约千年。可以说,朱熹拨千年之乱而反正,重新建立起儒家的道统和树立起孔子的崇高地位,把中国文化的主导权从佛、道那里夺回来,使中国文化生命返本归位,并开创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光辉灿烂的未来。这就是历代常说的朱熹“继绝学”。朱熹集濂、洛、关等诸理学以至整个传统文化之大成,创立闽学,在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形成为国家新的文化重心。有的称其为武夷文化,闽学是其核心。当时和朱熹齐名的理学家张栻说:“当今道在武夷。”<sup>③</sup>指的就是国家的文化重心转移到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南宋的首都在临安(今浙江杭州),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据中国经济史学家研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至北宋后期已接近完成,至南宋则全面实现”。<sup>④</sup>至此实现了中国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

清高宗乾隆元年(1736),状元马易斋治闽,深领意会闽中理学之渊源,题书“道南理窟”四个大字欲刻武夷山崖未果;后其子马应壁任职崇安县,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将其父“道南理窟”摹刻于武夷山五曲溪南晚对峰石壁上,正对着游酢之水云寮和朱熹之武夷精舍,数里外就可以看至。“道南理窟”遂成为游酢、杨时等“道南”和闽学兴盛以至中国文化重心南移至武夷山一带后的象征。

### 三、由闽学到朱子学

闽学的时空范围,可以分两个大方面。一是它在故乡福建的产生、衍变和发展;二是它超出福建范围成为全国和世界性的学说后,虽然它不能再称之为闽学而称之为朱子学,因为朱子

① 邵伯温《邵氏见闻录》卷一九,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页。

② 脱脱纂《杨时传》,《宋史》卷四二八,《二十五史》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4页。

③ 张栻《建宁府学游胡二公祠记》,《南轩集》卷一一,影印《四库全书·集部》本。

④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7页。

学是闽学的发展和扩展,仍然是闽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闽学在福建确立后,然后再北传至全国,并汪洋澎湃以至国外,成为东方文化的主体意识和世界性学说。清张伯行在为明朱衡《道南源委》所作的《序言》中说:

至考亭朱子、勉斋黄氏,师弟子之传授,朋友之讲习,奋然兴起者,如云汉之昭回,如江河之莫御。理学名区,独盛于闽,不惟比拟伊洛,直与并称邹鲁。而程子“道南”一语,遂符合如左券。噫嘻!闽滨东海,屹立武夷诸名胜,元气融液,人与地会,当吾世复有兴者。乌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也。尔诸生景行前哲,能自振拨,以斯道为己任。吾见闽学之盛行,且自南而北,而迄于东西,不局于一方,不限于一时,源远流长,汪洋澎湃。道之所谓流动而充满、弥沦而布濩者,于是乎统贯于“载道”之人矣!<sup>①</sup>

张伯行的这段话,十分深刻地论述了闽学超出福建范围,在全国和东亚的发展和传播,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国际性的朱子文化运动。

随着闽学超出福建范围向全国传播,其政治作用急剧日增。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诏定国家科举考试以朱熹《四书集注》、真德秀《大学衍义》等闽学著作为准。清圣祖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辑《朱子全书》,颁行全国。南宋末元明清时代,朱熹等闽学家的一些主要著作和其对儒家经典的注疏是国家法定教科书,文官考试不出闽学界限。朱子学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主体思想,是国家和民族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方式。

南宋末以来,朝野定论:中国文化的主体儒学其代表者前期是孔子,后期即朱子,是后先相继的同等级的;而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典籍大都经过朱熹等闽学家比较准确的整理和注释过,研究孔子思想也就是研究朱熹等闽学家的孔子思想。因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被概括为“孔朱学”。南宋理宗诏说:

朕惟孔孟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朱熹精思明辨,拆衷会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彻,孔孟之道益以大明于世。<sup>②</sup>

赐朱氏故居为“文公阙里”,与“孔子阙里”(曲阜)并称,春、秋行“泰坛之礼”。明代宗“诏朱熹建安(按今建瓯)后裔九世孙挺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在建安建博士府;世宗又诏婺源朱熹后裔十一世孙暨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代代相传,延续至清末。<sup>③</sup>

闽籍闽学家李光地建议朝廷提倡朱子学,用朱子学治理国家,得到皇帝的采纳。康熙皇帝说“读书五十年,只认得朱子一生所做何事。”又说“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没有一字一句不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集大成而继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sup>④</sup>康熙皇帝命李光地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书颁行全国,以广流布。于是,国家的文化思想又走上以新儒学(朱子学)为正宗思想的轨道。在历史上,文化落后、人口仅百万的满族,统治四五亿人口的庞大国家二三百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由于闽籍闽学家李光地等向皇帝极力推荐并实施闽学,使其沿着中国主体文化朱子学的方向治理国家。康熙时代是清朝最辉煌的时代,是公认的中国文化史上朱子学的天下。事实证明,沿着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才是中华民族的出路。

国学大师钱穆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命,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sup>⑤</sup>集大成的闽学思想体系,一方面一二个后学不可能全面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集大成”必然会解体 and 分化。南宋末年至明清之际,闽学超出福建范围,在内涵和派别上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经由南

① 张伯行《序言》朱衡《道南源委》卷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页。

②③ 戴铤《褒典》,《朱子实记》卷九,明正德鲍雄刻本,影印《四库之外古籍·传记类》本。

④ 康熙《御制朱子全书序》李光地、熊赐履纂《朱子全书》卷首,影印《四库全书·子部》本。

⑤ 钱穆《朱子新学案》,第1页。

宋末年的真德秀、魏了翁,元朝的许衡、吴澄,明朝的吴与弼、陈献章等人,演变为以明朝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一是经由南宋末年的黄震、文天祥,元明朝的刘因、薛瑄等人,演变为以明朝罗钦顺、王廷相为代表的气学。到了明朝中叶,这种分化完成。罗钦顺与王阳明的论争就是这种分化的结果。最后,出现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儒等。这是20世纪末以来国内外对宋明理学研究的重大成果,梳理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思想文化是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发展线索。<sup>①</sup>宋末至明这三四百年,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同步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文明发展,就是今天所说的现代化(近代化)。牟宗三说“三大儒的思想不幸被满清的异族军事统治堵回去了,开发不出来。”<sup>②</sup>孙中山接续明末清初开出近代文明的大方向。其新三民主义,又和毛泽东等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联接起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源头活水是闽中学者游酢、杨时等的“载道南归”和朱熹的格物致知论、自然科学精神等。<sup>③</sup>

闽学于宋元间传入韩国、日本、越南等,支配东方诸国的思想文化数百年。一般认为,儒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三个时期,即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和当今的现代新儒学。对于第二期儒学,美籍哲学家杜维明在《儒家哲学与现代化》中说:

第二期儒学的发展,也就是中国的宋明、朝鲜的李朝到后来日本的德川,儒学成为地道的东亚文明的体现。以后这个传统在越南也有相当的发展。越南在法国殖民地主义征服以前,受到儒学的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今天,在许多地方,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的行为,都受到儒家的影响。所以,(日本)岛田虔次指出:儒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这就是说,儒学不完全是中国的,也是日本的、朝鲜的、越南的。这是儒学第二期的发展,有800年的历史。……朝鲜的李朝大概从1398年或1392年开始建朝,直到1910年日本侵略朝鲜灭亡,跨越中国明清两代,是东亚大王朝,这个朝代的指导思想就是儒学,其中非常突出的思想家就是李退溪(即李滉)。从李退溪到他的学生李栗谷(即李珥),儒学有非常大的发展,这个发展的基础即是中国的朱学,也就是朱熹学统的发展。<sup>④</sup>

朱子学是“东亚文明的体现”,韩国退溪学、日本朱子学等是朱子学的分支。李退溪的思想被称为退溪学,是当今国际文化学术研究的热门课题。朱熹、李退溪等新儒学家,把孔孟儒学更加具体化,成为东方诸民族成就人生价值和人格升华的楷模,体现出了儒学是东方文化的主要表征。闽学超出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成为全国以至东方文化的主要表征,它于近代又传入西方,成为世界性的学说。

#### 四、朱熹之后闽中闽学的繁盛

闽学于宋元间超出福建范围而成为国家的主体思想和世界性学说后,在其故乡福建仍然继续衍变发扬光大,著名闽学家层出不穷,使闽学思想体系进一步完善和充实,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学术内容,不仅完善和发展了朱熹的思想体系,并成为福建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对福建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清人陈衍楫在讲到元末明初著名闽学家吴海时说:

① 蒙培元《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0页。

② 牟宗三《引言》,《阳明学讨论会文集》,台湾师范大学1988年,第1页。

③ 近年,厦门大学哲学系乐爱国教授承担国家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百年来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其研究成果表明,民国时期的知名学者,诸如唐才常、谢无量、江恒源、吕思勉、陈中凡、辜鸿铭、李石岑、姚廷杰、胡适、牟宗三、朱谦之、周予同、吴其昌、高名凯、冯友兰、贺麟、熊十力,以及吕振羽、赵纪彬等,皆异口同声地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论、自然科学观,与近代科学精神相吻合。他们都试图从朱子学中疏导出中国现代化(近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可惜这一思潮昙花一现,就被“全盘西化”所湮没,未引起重视。

④ 杜维明《儒家哲学与现代化》,《论中国传统文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97、120页。

闽学之倡也始于龟山(按指杨时),其盛也集于朱子,其末也振于西山(按指真德秀)。又二百余年,而剩夫陈氏(按指陈真晟)、翠渠周氏(按指周瑛)、虚斋蔡氏(按指蔡清)。向非有先生(按指吴海)之辟邪崇正,倏然挺出于绝续之间,何以继以往而启将来哉!<sup>①</sup>

这里陈衍铨讲杨时是闽学的创始者,是明清学者的一般观点。上面已有所指出,实指闽中早期理学,或称道南学。陈衍铨所强调的是,在朱熹之后,吴海在闽学发展过程中居有继往开来的关键性地位。对吴海之后的明代闽学,清代闽籍知名闽学学者李清馥说“由元阅明成化间,蔡虚斋、陈剩夫、周翠渠诸贤,后先生(按指朱熹)讲学,称一时之盛。中明以后,学术漓杂。”<sup>②</sup>“学术漓杂”是指明中叶王阳明心学出现后,攻击朱子学,全国朱子学急趋下坡。阳明学是经由朱熹后学,南宋末年的真德秀、魏了翁,元朝的许衡、吴澄,明朝的吴与弼、陈献章等人,从朱子学中发展出来,然后与朱子学相对立。这在哲学上叫做异化,即从母体分化出来后又和母体相对抗。这在日常生活中的实例是很多的。王阳明始终打着朱子学的旗号与朱子对立,如其撰写《朱子晚年定论》等。但是,闽学却在和阳明学的辩论中有一定的发展,至清代而不衰。清代闽籍知名闽学家李光地说:

吾闽辟在天末,然自晦庵朱子以来,道学(按闽学)之正为海内宗。至于明兴科名,与吴越争雄焉。<sup>③</sup>

“与吴越争雄”,就是指闽学在与以阳明学为代表的江浙文化并驾齐驱,不相上下。特别是清代初年,李光地等闽学家,为纠正明中叶以来阳明学派对朱子学诋毁所造成的影响,竭力提倡朱子学,使闽学复兴起来。

由两汉开始的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思维方式——经今古文学,到了宋明,又演变成为宋汉之学。清代前期以朱子学为核心的宋学盛行。一般认为,当时的宋学程朱学派,以李光地、汤斌、张履祥、陆陇其等为代表。李光地是清初提倡闽学的代表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达到了他那个时代闽学的最高水平。经今文学与宋学接近,强调“经学即理学”,<sup>④</sup>通过义理思辨,重在发扬经书中的“微言大义”,倾向于哲学。清知名经今文学理学家方东树(安徽桐城人)用功于心性之学,认为朱熹与孔孟无二。别人所著书凡与朱熹著述抵触者,他便进行辩解。他所著《汉学商兑》,为宋学辩护,力诋汉学之非。他在该书《自序》中说:

近世汉学,辟宋儒、攻朱子,以言心言性言理为厉禁。观其所著书,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制度,弃本贵末,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煞,名为治经,实足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道。<sup>⑤</sup>

方东树批判汉学多切中要害。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出来后,汉学渐熄,汉学古文经学派此后不久一落千丈,被今文经学派公羊学家所代替。清代还有王懋竑(江苏宝应人)撰著《朱子年谱》。特别是清人张伯行(河南仪封人)在抚闽期间,编辑《濂洛关闽书》19卷,闽士翕然向风,大开闽学研究之风。

## 五、闽学的两大领域

闽学的重大特点和优点,是闽学的著述义理诠释与事迹考察辨析并行,形成闽学思想研究的两个大领域。

① 陈衍铨《序》,吴海《闻过斋集》卷首,影印《四库全书·集部》本。

② 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首《原序》,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③ 李光地《重修文庄蔡先生祠·序》,《榕村全书》第11册《榕村全书》上卷一0,影印《四库全书·子部》本。

④ 清顾亭林语,转引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⑤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首《自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页。

闽学思想的核心命题是“性与天道”,论及经学、哲学、道德、宗教、文学、美学、科学、教育、史学、政治、经济等中国文化的诸领域。性,即人性,闽学家也讲物性。先秦典籍《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易·乾卦·彖辞》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和太和,乃利贞。”提出性、道、教三个范畴。闽学家们沿着这三个范畴,综合《大学》《孟子》《论语》等,探讨“性与天道”的问题。闽学以儒学为主干,汲取释、道之学等诸种传统思想,结合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发展起来,并由地域性学派上升为国家的主体思想。

闽学思想体系的出发点是天理论。闽学所继承的是儒家的“为己之学”,朱熹之后的闽学学者称之为“治心之学”,把成就“内圣成德和外王事功”作为核心价值。闽学是由躬行践履来展示自己的天理论思想体系的。一般处理闽学思想之不当,乃是由于受到西方主客观相分立二元论思想的影响,先由其形上学天道观讲起,然后才讲他的心性论、践履论,这样的讲法是整个的本末倒置,以至把握不到闽学思想的核心价值之所在。

闽学的创立者朱熹,是由“中和”问题的参究把握住制心的枢要的,其天理论之形上学由此逼出。这就是遵循孔子的下学(日用践履)上达(心性理天)的“为己之学”“内圣之学”之教的。朱熹说“道学不明,元来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无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实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践履自然纯熟。”<sup>①</sup>这种由具体体会抽象的思维架式,闽学学者是代代相传的。直到清代,著名的闽学家李光地奉旨纂辑《朱子全书》,其架势仍是从小学、大学起,然后及于天道性命之说。清张伯行在讲到明知名闽学家陈真晟时说“吾儒之学则不然,以穷理为端,以力行为务,体之于身,而实推之于家国天下而无不当,至语其本源之地,不过曰此心之敬而已。”<sup>②</sup>这就是说,闽学是门唯理的和实践的学问。具体之,就是以格物穷理和居敬存养并进互发为主旨的新儒学。他们遵循程氏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教导,将居敬存养即实践工夫作为学说加以提倡。这是闽学所独具的特色。闽学的居敬存养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内在的心性存养,二是对天理的体认。这二者是紧密的联系着的,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闽学学者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家。在闽学思想的研究中,学者们应特别注重其以文教化的功能。闽学家以言教人,更为重要的是以身教人。朱熹所到之处叫“过化处”,是其后历代文化教育和精神文明昌盛的中心。直至今日,走一趟“朱子之路”,其道德意识就有显著的提升。反复走“朱子之路”,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途径。

走“朱子之路”是近年闽台学界兴起的,迄今已举行过十多次。就是由朱子学专家、学者和朱子学爱好者、学生(主要是大学生)等组成团队,举行开班典礼,然后沿着当年朱熹等闽学家的足迹考察辨析,由专家沿途讲解。在事迹重点的地方,如尤溪朱子诞、建瓯博士府、五夫紫阳楼、武夷山武夷精舍、建阳考亭书院等地,住一两天,由专家讲课和学员说体会。最后举行结束典礼,发结业证书,把专家的讲词和学员的体会结集出版。

闽学的事迹考察辨析之所以成为闽学研究的一大领域,就是因为闽学是“为己之学”,是“内圣之学”,闽学家们概括为“治心之学”。朱熹所到之处为“过化”,就是因为朱熹以身教人。明知名闽学家陈真晟认为,要先得朱子之心,“拳拳以主敬穷理修己为首训,以口耳浮靡之习为痛革,正与程朱心教之法相表里,真所谓大哉皇言者矣”,“以程朱心学以端国本,激治源而正风化”。<sup>③</sup>“主敬穷理”就是治心。清闽学家董能灵说:

心者万化之源,由心而著之于身,则为言行;由心而施之于事,则为政教。古人之学必先有以治其心。治心之道奈何?曰:必欲其清而不欲其浊也,欲其定而不欲其扰也。由是

①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0页。

② 张伯行《原序》,陈真晟《陈剩夫集》卷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页。

③ 陈真晟《再上当道书》,《陈剩夫集》卷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3页。

内以检其身而枢机不失,外以施诸事而正教旁达焉。<sup>①</sup>

为了阐发朱熹的治心之学,陈真晟著《心学图说》,把主敬存心(穷理)和知行并进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强调“治心修身”是朱子学的入门要道。<sup>②</sup>

闽学的心学与心学派的心学是根本不同的,前者为认识论和道德修养论,后者则是本体论。对此,清张伯行在讲到陈真晟时有深刻的分析。他说:

或问余曰:陈布衣先生之书多言心学,近世立言之士谓心学,异端之教也。先生以之为言可乎?予应之曰:横渠谓观书当总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以言,则圣贤之言,其为异端所窃而乱之者,岂可一二数!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为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释氏亦言心。孔子曰:从心所欲不踰矩。孟子亦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释氏乃曰:即心即佛。是释氏徒事于心,何尝知学。吾儒之用功则不然,以穷理为端,以力行为务,体之于心,而实推之于家国天下而无不当。至语其本源之地,不过曰:此心之敬而已。自尧舜以迄周公、孔子,自孔子以迄周、程、张、朱,未有能舍是以为学者。上蔡谢氏曰:常惺惺法,在吾儒言之则为敬,在释氏之则为觉。先生之言心,不过谓其活变出入无时,非主敬无以操持之也。可与异端之虚无寂灭同日语哉!先生取圣要四说系于法天一图,曰主一无适,曰整齐严肃,曰常惺法,曰其心收敛不容一物。嘻!尽之矣!<sup>③</sup>

可见陈真晟言心与心学派言心,字句相同而实质不同,正如孔子、老子皆言道德,其含义各异;子思、陆九渊皆言尊德性,其本质不同;韩愈、朱熹皆言道统,而途径背驰。

闽学的这套修养工夫,已经展现出闽学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和实用价值。闽学是成熟心智、健全人格、安身立命之学。

## 六、闽学研究的价值意义与方法

闽学的传承与衍变,到清末民初基本终结,其后是对它的研究与发扬,古为今用。

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压制国学。特别是“五四”时期,把国家的落后、民族的受辱错误地归罪于传统文化上,“打倒孔家店”,朱子学受到严厉批判。但是,曾国藩、唐鉴、张之洞、严复、辜鸿铭、冯友兰、梁漱溟等,推崇维护朱子学。唐才常《〈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1898)、谢无量《朱子学派》(1916)、辜鸿铭《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1924)、周予同《朱熹》(1929)、吴其昌《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1930)、唐文治《紫阳学术发微》(1930)、吕思勉《理学纲要》(1931)、陈中凡《两宋思想述评》(1931)、冯友兰《朱熹哲学》(1932)、姚廷杰《朱学钩玄》(1934)和高名凯《朱子论心》(1935)等,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朱子学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都是这个时期知名的学者,他们都十分肯定朱子学、闽学的学术文化价值,特别是试图从其“即物穷理”等思想中疏导出现代科学意识,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文化传统精神。

1930年阴历九月十五日朱熹诞辰前后,全国学术界开展了纪念朱熹的活动,全国性报刊出版专号。如12月27日,上海《大公报·文学副刊》出版专号“朱晦翁诞生八百年纪念”,刊出吴其昌《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等多个知名学者的文章,发扬朱熹的文化思想。在朱熹长子朱塾的繁衍地建瓯博士府举行了祭祀“朱文公诞辰八百周年”,持续3天。由当时省教育厅督导叶积新、建瓯县长刘达潜等轮流主持“官祭”。参加者除闽北朱氏、社会名流外,还有国外人士。

① 董能灵《澄心堂碑记》,《冠豸山堂全集》卷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6)连城童氏木刻本。

② 陈真晟《答耻斋周轸举人书》,《陈剩夫集》卷二,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2页。

③ 张伯行《陈布衣文集序》,《正谊堂文集》卷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92页。

20世纪30年代,福建协和大学成立福建文化研究会,创办《福建文化》杂志,刊出“福建理学”专号,<sup>①</sup>把历代福建理学系统概括为“福建文化”,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是福建“大文化”的核心部分,可以说是闽学概念发展的新阶段。

到了现代,朱子学被认为是唯心论,曾一度受到批判。特别是20世纪后半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南方批判“孔子第二”朱熹,朱熹及其后学的思想受到严厉批判,闽学事迹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当时出版的《朱熹的丑恶面目》《朱熹丑史》《批判朱熹专辑》等,书内目录和文章题目就使人啼笑皆非,诸如“反理学的鼓吹者”“反法的急先锋”“两面三刀”“朱熹理学是杀人的软刀子”等。<sup>②</sup>但是,正是在这十分严峻之时,福建人极力维护闽学事迹和闽学学说。闽北有张木良、蒋步荣、金文钦、朱庆珪、黄向阳、庄炳璋等。厦门大学教授陈在正、周祖谟、李家田、高令印等被上级派至闽北“批林批朱”,但他们不仅不批朱,还保护和搜集大量闽学事迹,如在建瓯发现丢弃于乱石中的朱熹“对镜写真题以自警”石刻碑,极其珍贵。后来高令印《朱子事迹考》主要依据这个时期搜集的文献。当时,厦门大学校刊室下放闽北的干部陈天霖,把朱熹在闽北的遗迹大部份拍摄成照片,写成《武夷山水》一书。<sup>③</sup>所有这些,是在严峻时期保护了朱熹事迹和传播了朱熹思想。

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基于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相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史学会等国家学术单位和知名学者,倡导研究和发扬宋明理学。1981年10月,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和浙江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杭州宋明理学研讨会”,文革后首次邀请美国、日本等海外学者参加,引导了而后国内外研究程朱理学的大方向,省内外以至国外形成研究朱子学的热潮。在福建,专业和业余工作者,特别是省市县方志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方法,全面开展闽学的理论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福建闽学的主要人物大都成立研究会、宗亲会、基金会,以闽学和闽学人物为纽带深入开展闽台文化交流活动,对祖国的统一和团结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0世纪末以来,一些研究福建文化的学者,基于中国古代社会于唐宋间由前期往后期过渡,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中原一带转移到南方闽、浙、赣之武夷山一带,成为以朱子学为主体的新的国家文化重心,提出“武夷文化”说。闽学是“武夷文化”的核心部分。“武夷文化”可以说是继“福建文化”之后闽学概念的又一新的发展。<sup>④</sup>

鉴于当今世界对儒家思想现代化的研究热潮,自然对集儒家思想之大成的朱子学也加以特别重视。几年来,国际间频繁地举行朱子学和与朱子学有关的国际学术会议,特别是对朱子学的分支韩国退溪学研究热潮,对闽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数十年来,福建对朱熹之后闽学故乡福建闽学的衍变和发展,在福建开发和文明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以及它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等等,很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频繁地举行形式不断翻新的有关闽学的活动,如研讨会、文化节、宗亲会、“走朱子之路”等,在学术、文献搜集整理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对朱熹之后的闽学在它的故乡福建的衍变和发展,南宋元明清时代已有些学者进行研究。但是,他们所撰写的闽学“源流”“渊源考”,以及“道南原委”之类的著作,多为罗列人头的记传体,大同小异,没有全面综合论述闽学的一般特点、历史作用和社会价值,对我们今天研究闽学无多大借鉴之处。

我们今天研究闽学,在资料上要全面搜集,在观点上要发凡起例,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① 福州福建协和大学福建文化研究会《福建文化》,1937年4月第4卷第24期。

② 上饶地区革委会《朱熹的丑恶面目》,江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10月;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朱熹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2月;建阳地区宣传组编《批判朱熹专辑》,1975年5月印。

③ 陈天霖《武夷山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④ 高令印《简明中国哲学通史》,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9—340页。

思想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综合分析。古为今用,对照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现代人的思想文化水平。习近平同志说“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sup>①</sup>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闽学思想的地位和价值,紧密地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努力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不断地提升福建文化的软实力、影响力和竞争力,把闽学文化打造成国家级、世界级的文化品牌。

在闽学的研究上,过去纯学术的经院式的研究,扼杀了闽学的生机和价值。因此,必须开启闽学研究的新境界,用解释的方法代替阐述的方法,在“应用”上下工夫,挖掘闽学思想的借鉴和启示价值。首先,在闽学的观念中有今天人们照着做的部分。时代在前进,总要从已积累的哲学文化总体中把符合进步潮流的成果转化为现时代的文明。如“仁义道德”,其共性、超越性就适应现代社会。仁是确立人的主体性格,说明人的存在和价值;义则规定人在言行和思想中必备的德性素质,二者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存在。朱熹说“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乃所谓道者也。”<sup>②</sup>“仁义道德”是常理常道,我们今天可以照着做。其次,赋予某些闽学观念以现代价值。此即所谓“旧瓶装新酒”,亦即冯友兰所说的“抽象继承法”。朱熹说“释言空,儒言实。释言无,儒言有。……释言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释氏以事理为不紧要而不理会。”<sup>③</sup>就是在佛家的空理中填进实理,便成为儒家的思想。利用佛家的外壳,装进新的内容。实际上,佛家的“月印万川”是闽学家“理一分殊”的来源之一。再次,创造性的诠释。中国古代经今文学,有所谓“六经注我”<sup>④</sup>等命题,主要就是创造性的诠释。对于闽学的命题、观念,不仅指出其本意是什么,可以进一步指出应当、应该说什么,从中启发、引申出什么,等等。“应用”是一种加工、启示,可以保留其框架,装进新的内容,肯定其积极因素,抛弃其消极因素,从中悟出一些道理,这些道理可能是闽学家们本人也没有想到的,像有人从八卦中悟出二进制那样。例如,闽学家的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改革、人才培养,闽学家们办书院的经验与当今社区书院的创办,闽学家道德教育的得失与现代道德教育的结构,闽学的伦理思想与现代的社会病,朱陆之争与现代学术争鸣,等等。<sup>⑤</sup>现在有人撰写《朱子学启示录》之类的具有强烈时代感和现实感的著作。这种开启闽学研究新境界的势头,是时代和现实的要求和需要,是闽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闽学在新儒学中特别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成贤成圣,是“治心”之学,是“内圣外王”之学。以传统方式按学科分类、不同角度的研究已趋向饱和,再这样继续下去,会在过去已涉及到的理呀、气呀等问题上兜圈子,难有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很多研究成果缺乏可读性和普及性,作者群即读者群,在闽学著作的范围内反反复复,扼杀了其思想的生机和文化价值。因此,必须继往开来,开发出闽学思想研究的新领域和新境界,把闽学的成熟心智、健全人格、安身立命之学的内在本质阐发出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资源,为提升现代人们的道德伦理风尚服务。

① 黎昕《闽学研究十年录》,福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② 朱熹《尽心下》,《孟子集注》卷一四,《四书五经》上册,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12页。

③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二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15页。

④ 章学诚《内篇·易教上》,《文史通义》卷一,岳麓书社1993年版,第1页。

⑤ 饶祖天《朱子学研究方法的新开拓》,《朱子学刊》1987年第2期。

## **The Setbacks and Survival Strategies of Taiwan's Left – Wing Thoughts in the 1990s**

Liu Xiaoxin

In the 1990s ,Taiwan's left – wing thoughts suffered hard times under the oppression of four ideological forces: the “end of history theory” and the “end of ideology theory” brought by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drastic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neo – liberalis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ought; indigenous thought; and the “postism” with post – modernism , post – structuralism and post – colonialism as the core. Being confronted with ideological challenge and competition ,Taiwan's left – wing thoughts are on a research position of establishing a radical left – wing society in Taiwan ,reconstruct a critical vision and the ability to intervene by importing cultural studies ,advocate for edge combats and queer left – wing line ,practice “lifting of body curfew” and left – wing theatre shows ,promote the left – wing alternative media to strategically respond to their network survival ,thus having opening up a new historical space.

## **A Prologue for the Min School**

Gao Lingyin

The Min school refers to the thoughts of the school of Zhu Zi and his disciples residing in the middle of Fujia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the thoughts of Fujian's neo – Confucianists later on. The Min school is thus named together with other regional schools , a collection of regional schools of Lian , Luo and Guan. Other than an ordinary mid – Fujian school in the history , it is always correlated with the trend of neo – Confucianism in the later period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 which has formed its core foundation. The Dao Nan school of You Zuo , Yang Shi , Luo Congyan or Li Tong prior to Zhu Xi is a sort of “pre – Min school” , if without Dao Nan school , there would be no Min school. The major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of Min school are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moral principles in the scholarly works is in parallel with the examin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of moral deeds. Zhu Xi educated and civilized the populace wherever he went. He who “follows Zhu Xi's footprints” can raise his moral awareness. Since researches on Min school are jam – packed in conventional ways , the research results lack readability and popularity , and the authors are just the readers , which has strangled the cultural value of “learning of cultivating the mind” in Min school. Therefore , we should open up a new boundary for Min school studies , elucidate the inner nature of a mature mind , healthy personality and settlement of life , make them become a major resource for “building Fujian into a culturally strong province”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